



东方学术文库



# 心旅第一驿

中国古代  
社会文化心态之源

赵辉

东方出版社



# 心旅第一驿

中国古代

社会文化心态之源

赵  
辉

東方出版社

策 划:柯尊全

责任编辑:柯尊全

封面设计:曹 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旅第一驿——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心态之源/赵辉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4

(东方学术文库)

ISBN 7-5060-1610-9

I. 心… II. 赵… III. 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国-古代

IV. C9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8512 号

## 心 旅 第 一 驿

——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心态之源

XINLU DIYIYI

赵 辉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3.5

字数:310 千 印数:1~3,800 册

ISBN 7-5060-1610-9 定价:26.00 元

# 序

冯天瑜

近二十年来，中国文化史研究有长足进展，除文化通史、断代文化史著作纷纷涌现之外，学人也注目于文化的分层考察。笔者在《中华文化史》中提出文化结构四分法，将文化分做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又将心态文化（或曰“精神文化”、“社会意识”）区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层次。“社会心理”指人们的精神状态和道德面貌，是尚未经过理论加工和艺术升华的流行的大众心态，诸如人们的需求、愿望、情绪、风尚等等。它们较直接地受到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影响与制约，并与行为文化交融互摄，相为表里。“社会意识形态”则指经过系统加工过的、定型了的社会意识，它们往往是由文化专门家对社会心理这一中介进行理论的或艺术的处理，曲折地，同时也更深刻地反映社会存在。总之，在文化多重结构中，“社会心理”是一个承接上下、沟通雅俗的中枢环节。中国古代，朝廷设置专门机构，致力于“观俗”、“采风”，便是着意于把握社会心理，以期“移风易俗”；近人梁启超力倡“新民说”，鲁迅深入探讨“国民性”，也是出于对“社会心理”重要性的真切认识。

“社会心理”虽然被古今有识者所重视，但作为一种研究对象

被学人详加解剖、细密考辨却并不多见,偶尔触目的,也往往是社会学工作者关于现当代人群心理的调查和简要分析,穷本溯源的历史性观照至为罕见。令人高兴的是,赵辉教授所著《心旅第一驿: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心态之源》一书,是解析古代中国社会心理的力作。是著从古代中国各阶层人们的 worldview、审美观、政治观、生命观、价值观、宗教观、伦理道德观、文艺观,以及风俗习惯、人格理想诸侧面展示社会心态,特别用力于这些社会心态的推原究委工作,而“从起源中理解事物,就是从本质上理解事物”(杜勒鲁奇语)。是著兼取传世古文献和出土文物,并参酌西方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古代中国人的鬼神观、人道观、功名观等群体心理做探本溯源的考究,每每别有会心,直逼社会心理的本质。作者从事这项工作久历岁时,此前已有《楚辞文化背景研究》、《六朝社会文化心态》二书面世,与本书正好前后辉映。笔者衷心期望,这种关于中国人的文化心态、社会心理的考察向纵深发展:一是开掘新的资料,二是在理论与方法上有所创造,以期构成富于中国气派的、并能与国外同行对话的社会心理研究体系。

2001年12月20日书于武汉大学寓所

# 目 录

<b>导言</b>	.....	1
<b>第一章 鬼神归隐</b>	.....	13
一、人助神虐	.....	13
二、放逐上帝	.....	25
三、“有”“无”之间	.....	37
四、神殿花残	.....	51
<b>第二章 从兽到人</b>	.....	65
一、残忍的进步	.....	66
二、民权可恤	.....	83
三、篱下之思	.....	100
<b>第三章 人生在世</b>	.....	115
一、后羿情结	.....	115
二、修己求名	.....	129
三、使命与立言	.....	143
四、粪土乌纱	.....	155

<b>第四章 理情相搏</b>	167
一、是非性情	167
二、枷锁不朽	188
三、酒神不死	205
<b>第五章 弃多求一</b>	227
一、众理归一	227
二、王权无极	241
三、求同之异	259
<b>第六章 有智无力</b>	276
一、力的亢奋	277
二、尚学求知	290
三、目注智谋	303
<b>第七章 白日寻梦</b>	321
一、古道热肠	321
二、幻灭之悲	335
三、除旧图新	350
<b>第八章 亲近自然</b>	361
一、原始体验	361
二、物我同一	380
三、仪象天地	395
<b>后记</b>	413

# 导 言

## 一

什么是“社会文化心态”？要说清这个问题，我感到颇有些为难。

当然，为难的不止于我。有些平时看起来人人都清楚的概念，一到学者们那里，就变得复杂起来，是极为平常的事。比如大家开口“文化”闭口“文化”，但要讲清楚什么是“文化”，就是很不容易的事。

在西方，“文化”这一概念的年龄至少也有 500 岁了；在中国，它的年龄则更长。时间一长，这一概念的使用就免过于宽泛，“文化”的定义自然也就纷繁复杂化了。据不完全统计，时至今日，它的定义已经将近两百种。西方著名的人类学家泰勒将“文化”定义为：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所得到的能力与习惯，将“文化”限定在精神方面。而英国的社会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却对泰勒的这一定义并不赞同。他将人类生产的物质产品也界定在“文化”的范畴，认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形成，相互作用，共同实现着“文化”的功能。在我国，现当代的一些学

者,如梁漱溟、冯友兰、冯天瑜等,则更多地对马林诺夫斯基关于“文化”的界说持肯定态度。冯友兰便认为,中国文化就是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的总合体。<sup>①</sup> 冯天瑜综合中外各个文化学派观点的合理部分,也对“文化”作了这样的界定:

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sup>②</sup>

根据这一界定,他将“文化”分为四个层次: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并将心态文化具体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层次,视没有经过理论加工的精神现象为“社会心理”,经过了专门家理论加工的精神现象为“社会意识形态”。

从当前社会对“文化”一词普遍的理解和使用情况看,梁漱溟、冯友兰、冯天瑜等对“文化”这一概念的界说是比较科学的。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对于文化的研究,最主要的还是集中在物态文化、制度文化和心态文化的“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社会心理”则为社会心理学所关注。社会心理中诸如兴趣、幻想、情绪、动机等问题,都是文化研究很少关注的问题。

应该说,我们所谓的“心态”,原本属于心理学领域;“社会心

---

<sup>①</sup> 参见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5~24 页。

<sup>②</sup> 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6 页。

态”则应该归入社会心理学术门庭。若简而言之，“心态”就是指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细加分析，它至少有下列几个方面的性质。

其一，它包含着人的精神活动的两个层次：一是人们对于外界的感性印象，二是人们对于外界的理性认知。从单一的认知过程看，感性印象在前，理性认知在后。但由于人们的认知活动并非都是单一的认知过程，对于其他事物的理性认知和经验，在人们对当下某些事物的认知时不可避免地产生着影响作用，因而，这感性的认知和理性的认知在认知过程中，往往交融于一体，难以分清哪在先，哪在后。

其二，“心态”也包含着人们对于外界反映的心理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当人们接受到外在的事物所给予的信息时，大脑就开始对这些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并因此而产生种种结果，诸如情感、情绪、兴趣、意向，包括信念、企图、幻想、追求、理想等等。没有心理活动的过程，便不会有这种种的结果。

其三，“心态”又包括精神活动的理论形态和非理论形态。如信念、追求、理想，显然都受思想意识的支配，属于思想意识这一理论形态范畴。比如说，某某的工作心态很不正常，就不仅仅是说他对工作有情绪，不负责任等，而且也包含着他这一工作价值追求的怀疑或某种信念的失落。我们说某个时期的文学心态怎样，也并非仅就这个时期的创作倾向和创作态度而言，更主要的是对这一时期文学价值的选择和文学主张加以评价。这文学价值的选择和文学主张也都属于文学理论范畴。

正因为社会心态的这些性质，一些社会心理学家也就不免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广泛化。上个世纪 20 年代，前苏联学者 W·冯特就曾提出，语言、神话、风俗、艺术、宗教等都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到 50 年代，前苏联关于社会心理学对象问题

的争论就有三派。一派认为,社会心理学就是关于“群众的心理现象”的科学,专注于阶级和大型社会团体的心理以及社会舆论的形成,以至于“时髦”这类的群众现象。而第二派正与此相反,给予个性以极大的关注。他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个性的心理特征、个性在集体中的地位、个性的类型等。第三派则力图综合前两种意见。他们认为,社会心理学是研究群众心理和个性在团体中地位的科学,并将各个学派所研究的问题全部纳入社会心理学的对象范围。70年代,莫斯科大学心理学系的安德列耶娃在区分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界线”时指出:社会学在理论知识体系中有“两个水平”:最高水平,即意识形态;最低水平,即社会心理。它们都与社会心理学的问题发生联系。社会心理学不排斥意识形态,但它最感兴趣的还是社会心理。<sup>①</sup> 美国的一些社会心理学家也认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所有领域,包括与社会现象直接相关的各种行为。但它一直瞩目的主题是:大部分各种重要的人际间的行为与情感——喜好、爱情、侵犯行为、遵从、合群倾向、交往和影响等。<sup>②</sup> 而我国目前学术界,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确定在个体的心理现象方面,具体而言,包括动机、态度、行为、自我意识、人际关系等各个方面。

从上面的论述看,文化学和社会心理学都存在一个研究对象不确定的问题。它们之间原本就有交叉,但也原本有自己特别注重的领域。因而,我们可以大概确定,“社会文化心态”是文化学

---

<sup>①</sup> 安德列耶娃:《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7页。

<sup>②</sup> J.L.弗里德曼等:《社会心理学》,高地、高佳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和社会心理学的交叉研究。它主要以文化学的“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为对象,而尤其注重的是社会心理这一层面。

## 二

近些年来,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正向各个领域纵深发展。尽管一些文化学家在观念上将“社会心理”纳入了文化研究的范畴,并且加以强调,但受人们对于“文化”传统概念理解的制约,中国文化研究工作者的目光大多集中在思想意识形态、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领域,而对文化心理层面的关注不多,系统的研究则更少。近些年,也有一批学者对中国古代的文人心态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出版了一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文人虽然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创造者,但他们只是社会的一部分;因而,他们的心态还不足以反映中国古代社会精神世界的整个风貌。

每一个社会的发展,都是当时社会人们行为的结果。而人们的每种行为都在人们精神观念的支配下进行。这精神观念包括两个方面:思想形态意识和社会心理。思想形态意识表现着文化精英对社会实践的理性认识。它对社会的反映虽然较社会心理更深刻和真实,但这深刻和真实只是历史的和观念的,而非当下的现实的。这也就是说,某些思想虽然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真实地表现了他们的某些追求;但他们追求的东西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由于他们都是用历史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去认识历史和社会,他们的精神也大多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老庄自不必说,即便是孔孟,他们孜孜不倦

追求的那个等级制度下和睦融融的社会，那个仁政之下的家家具有“五亩之宅”的农庄，也都与现实有着遥远的距离。正是他们的主张与现实格格不入，他们才有着时不我遇的哀叹。法家认识社会还是比较现实的，他们以人的本性作为依据，提出改革社会的各项主张；但就是法家的那一套，也不是与现实毫无间隔。因而我们说，思想形态的意识大多带有较为浓厚的理想色彩，只是“镜中之像”，并不完全具备社会实践的品质。

此外，意识形态对于当下社会反映的虚幻性，还表现在它具有某个阶级、阶层政治面具和思想家人格面具的性质方面。在现实社会中，每一个阶级、阶层和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种“面具”之中，都不可能将自己的真实全部展现给社会。不仅如此，“作秀”也是人们的嗜好；政治团体和政治家尤其是如此。当他们将自己展示给社会时，常常将自己的真实隐藏在“面具”之中。思想意识作为政治集团和政治家、思想家展示自己形象的“广告”，自然是花言巧语多于内在的真实。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没有哪一个统治者不在强调要为百姓谋取利益，但却没有哪一个统治者真正关心过百姓的利益；没有谁不口口声声表示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但却又没有谁不在干着损害国家和民族以牟取私利的勾当。孔子无时不在宣扬仁义礼乐，俨然一副圣人的模样。而真实的孔子和我们通过他的思想所认识的孔子却大不一样。季康子向孔子请教政治，说：“如果是杀掉坏人来使社会都归于有道，怎么样？”孔子说：“治理国家，何必要杀人！”<sup>①</sup> 但他掌权不久，便杀了少正卯。他教导学生应“食无求饱，居无求安”；<sup>②</sup> 但他自己却

---

① 《论语·颜渊》。

② 《论语·学而》。

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甚至是肉切得不方正、不放一定的调料都不吃。<sup>①</sup> 庄子口口声声要超然物外，齐一是非，不仅要“无功”、“无名”，还要“无己”。但是，现实中的庄子却没有忘却红尘，去掉是非，心中也没有一刻的平静。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在庙堂上都是一副儒家的面孔，而在家中，则是完全的道家的打扮。因而，我们若是仅从思想主张去认识，往往免不了要犯客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思想家绝大多数是依附于统治阶级的，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都由统治阶级把持。一个政党、一个人的思想意识反映的不是真实的他们，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自然也不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的真实精神状态。这在哲学、政治、伦理道德观念方面表现更为突出。如春秋时期，礼乐已是一片狼藉，而此时的思想家却在大肆宣扬礼乐。若我们根据他们对于仁义礼乐的强调而去认识当下的社会，结论便正好与当下的现实社会相反。所以说，仅从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去认识当下的社会，是很难把握当下社会的真实的。

但是，社会心理却不可能存在半点虚幻。社会心理包含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精神状态，反映着人们的日常生活风尚、愿望、意向、情绪和动机等等。在日常生活中，个体的愿望、意向、情绪和动机等虽然也受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支配和影响，但由于它和“本我”结合在一起，是“自我”和“本我”融合后的选择，因而，它所表现的是完全真实的自我。社会由众多的个体组成；众多的个体的心理趋向汇合成社会的精神风尚。因而，个体心理对于个体反映的真实，便构成了社会心理对于社会现实反映的真实。所以我

---

<sup>①</sup> 《论语·乡党》。

们说，社会心理虽没有经过理论加工，反映的问题没有历史的真实和深刻，但由于它支配着当下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更多地表现着人们行为和动机的一致性，因而也就更能反映当下社会的真实状态。

当然，由于人总是社会的人，人们的精神活动，都是外界作用的结果，因而，人们的愿望、决心、情绪和动机等，也必然要受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支配和影响。就是孔子这样一个一生进取、全身浸透在礼教溶液中的人，其心理也不免受当时社会思想意识的影响。他周游列国，四处碰壁之后，与子路、曾皙等偶然谈到志向时，曾皙说：自己希望在暮春三月，穿着春天的衣服，和几个青年与小孩，在沂水中洗个澡，在祭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家。孔子听后，禁不住由衷表示：“吾与点也！”<sup>①</sup> 孔子的这一向往，显然受到了道家出世思想的影响。

这种影响，也表现在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和个体或某个团体的观念的矛盾所导致的心理冲突方面。在中国古代，思想意识形态更多地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对于人们的思想行为有着拘禁作用。当某些个体和团体的思想行为与它发生矛盾时，统治者便会利用政治权力，对这些个体和团体的思想行为进行干预，由此而刺激个体和团体，产生一定的心理现象。如魏晋时期，阮籍、嵇康的那苦闷、孤独的情绪以及当时文人普遍的危机感和幻灭感，便是由与司马氏集团所极力维护的名教的冲突而诱发。

当然，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更主要的还是意识形态由社会心理进行理论加工而形成。前者为高级形

---

<sup>①</sup> 《论语·先进》。

态，后者为低级形态。但这只是从理论上说，至于怎样便是进行了“理论加工”，在实际情况中却有些不好分辨。在很多时候，它们往往混融于一体，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比如，对于个性的崇尚，既可以说是一种心理，也可将其归入个性解放的思想范畴。老子对于“小国寡民”的期待，陶渊明对于“桃花源”的向往，既表现着他们的一种社会生活的意向，也体现着他们的政治思想和主张。

由于思想意识形态不能真实地反映当下社会的客观现实，如果仅仅依据当时的思想意识形态去认识当下的社会，我们不仅难以窥见这思想意识产生的心理根源，而且，得出的结论也不可能 是科学的。但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这种非常密切的关系，也使得我们在研究一个社会的心理时，不能割断它和意识形态的联系。否则，我们同样不可能认识社会心理产生的原由，所看到的也同样不是社会的客观现实。所以，我们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必须将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结合在一起。

### 三

悠久而绵长的中国历史，通过积淀，培育出多彩的社会文化心态。这心态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特征，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状态。但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心态，只要穷本溯源，便能顺藤摸瓜，容易使问题趋于明朗。

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心态的源头，是就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心态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而言的，主要指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心态的起始形态。但我们要确定这一点并不容易。中国古代的文明，从原始社会到近代，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那么，这历程中

的哪一阶段是它的源头呢？

文化心态作为人类对外在事物的反映所产生的心灵现象，应该说，自人类进入智人时代就已经产生。而社会的文化心态，则应产生在人类结伴而居，即氏族社会产生之时。根据后人的记载和神话传说，我们可以推测，在神农氏时期，中国已进入了部落联盟时期。但神农时代似乎已进入农耕社会。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一些早期遗址，如河北武安县磁山文化遗址，曾发现许多用作窖穴的灰坑中有农作物的痕迹，遗址文化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5600年。而在新石器时代之前，还有一个人们以采集和狩猎为生活来源的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肯定还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氏族社会阶段。因而，我们要追溯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心态的源头，最早则应上溯到旧石器时代。

但是，不要说旧石器时代，就是夏代的历史，我们也只能从后人片言只语的记载和神话传说中寻找到一个模糊的轮廓。尽管我们可以根据神话传说和中外的一些人类学资料，推知这一漫长的历史社会的一些心理趋向，如：极强的氏族意义上的群体观念和平等意识；而详细的情况我们却无从知道。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虽然漫长，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政权形式和政治方法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等，都还处于极不完备、极不发达的时期。社会文化心态为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政治形式、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作用下的精神产物，在那个古老的社会里，自然也还没有完全萌芽。

在夏代，中国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到春秋战国，社会的生产关系、政治和政治的形式、社会意识形态的各个思想构件以及文化结构，都已基本确立。战国以后的各种思想观念都不过是这一时